

新经济、新理论、新模式

■ 杨培芳

我们的研究在圈内感到很有成效，但是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不大，甚至反对的声音大过赞赏的声音。所以刚才听了两位学者的介绍，我感觉又找到知音了，希望继续挖掘新经济规律，总结经济理论，形成更好的新经济模式。

我今天讲的题目就叫“新经济、新理论、新模式”，主要看看新经济在当前社会经济领域的位置。新经济的字面意思是新技术引发的新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新经济主要靠信息技术引领，一些更新的技术比如生物技术、航天技术基本上还停留在科学实验阶段，尚未进入经济循环。

2014 年 6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大量耗费物资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信息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可见在这里，新经济主要是指信息经济，当然你也可以包括新材料、新能源、新流通经济等等。

有人说信息经济也就是个三级部门的经济，早在 1987 年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筹备会上，就遇到这个问题。究竟信息经济是一个小部门的经济，还是代表未来信息社会的主体经济，要看社会经济发展取向。盛老师除了关注工业企业经济理论之外，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关注公共企业领域的学者，有人翻译成公共事业或公共领域。那么究竟公共经济领域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科斯教授认为公共领域就是公地悲剧，都应该私有化，所以会越来越少。可是现在又有许多学者提出，土地可以是地主的，工厂可以是资本家的，互联网是谁的？科斯理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连他赖以获诺奖的将无线电频谱私有化的主张，也正在被网络中立的社会化理论所代替。

随着信息通信和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现在又有人提出来要回到新计划经济，包括马云和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提倡回到精准计划经济。那么究竟将来是继续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还是走向新计划经济？还是走上一条更符合信息时代的新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又不能不回答的问题。

过去有句话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现在看来，生产力没发展到这一步，你把旧生产关系破掉了，新生产关系也立不起来。只能是历史循环：要饭的当皇帝，还是皇帝。近百年来，世界经济高地从钢铁、煤炭、机械、石油、汽车，发展到房产金融阶段，泡沫严重，日益病态，药方就在于发展信息经济实现社会信息化。而中国正是利用在信息领域的后发优势，实现了技术和产业的跨越发展。

信息经济基于三大基本技术：光导纤维技术、集成电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协议。我是搞通信技术出身的，1982 年转行研究经济。近 30 年，单根光纤的容量扩大了一万倍，传输成本下降了一万倍。现在承载全国 12 亿手机的移动通信网络，实际上是由几百万铁搭后面的光纤骨干网络在支撑。有人做过试验，现在买一根一公里长的，炒菜用的粉丝大概要 85 元。而要买根一公里长的光导纤维只要 35 元。集成电路有个摩尔定律，功能 18 个月翻一番，成本下降 50%，现在智能手机的主要功

能实际上是由几个集成电路芯片提供的。近 30 年，钢铁、水泥、电力、自来水，汽车票，火车票，没有一个不涨价的，只有 IT 设备和信息通信服务价格 30 年来是下降的。30 年前发电报，一个字要 3 分钱，现在发条短信 70 个字一毛钱，发微信更便宜，基本不要钱，而且还在不断地提速降费。为什么只有信息通信可以提速降费，火车飞机一提速就涨价？这就涉及到盛所长刚才讲的成本曲线问题。工业经济投资成本低，生产成本高，呈 U 字形曲线。信息经济投资成本高，运营成本低，没有物耗，呈 L 形曲线。通信网建成以后，只要在设计标准容量之内，增加新的手机用户，或者你的手机 24 小时上网，与每天几分钟上网成本是一样的。也叫做“边际成本为零”，所以才有了今天互联网这样的发展规模和速度。第三大技术是互联网协议，互联网技术本身就是一个软件，一个 TCP/IP 软件协议就解决了好多问题，将来要发展到第五代移动通信，互联网协议也从 IPV4—IPV6 发展到 IPV9，进入万物互联的物联网阶段。互联网正在成为继蒸汽机、电力革命以来的新型社会生产力。

信息生产力的发展给传统产业必然造成严重的冲击，甚至是灭顶之灾。现在一台智能手机干掉多少产业，整个电报产业、半个固定电话产业。还有传真机产业、家用照相机产业、摄像机产业、胶卷产业……

新技术形成的新经济促进了多个领域的变革。除了商业、社交、交通很快还会有工业和农业也在被信息经济改变。未来主要取向不是传统产业+互联网，而是互联网+传统产业。

有人说信息经济造成了失业大军，我们应该保护低级劳动就业岗位。其实信息经济主要是促使固定就业方式到灵活就业的转变，同时也造成低级劳动向高级劳动方式的跃迁。一位德国专家提出过人类劳动的五级分类模型，最低级的是纯粹肌肉式劳动，依次是位置移动式、机械操作式、信息操作式、智能创造式劳动。随着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低级劳动将逐渐被高级劳动替代。有人总希望维持低级劳动岗位，以增加低端人群的就业机会。这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对国家前途来讲将是灾难性的。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比较，有许多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经济特征。比如工业经济资源是独占的，信息经济资源是共享的；工业经济有增长极限，信息经济可持续发展；工业经济成本递减，或者叫做边际成本为零；最后一个重要特征是工业经济需要集中垄断，信息经济必须协同关联。

我也在思考虚拟空间经济集聚问题。我认为虚拟空间集聚和实体空间集聚虽然有相似之处，但不是一回事。从根本上讲信息经济是扁平的、相互关联的和普惠的，工业经济是宝塔结构和中心化的。虽然目前一些互联网平台也集聚到一两家大企业，一般按照市场细分不超过三家企业，但它是开放竞争的，是社会化的。它与钢铁大王、石油大亨，金融大鳄的垄断不是一回事。

我多次讲信息经济是普惠经济，主要是信息经济有三个基本定律：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梅特卡夫定律。这三个基本定律造成信



息经济具备如盛洪所长长期关注的显著的经济外部性。本来还有三个定律，我现在再补充一个达文多定律，就是在同一个细分市场中只有金牌、银牌、铜牌，铁牌可能就运营不下去，都是前三家。尤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领域，正在显示这个达文多定律。

我退休以后又完成了三个课题，先是给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做了《提升国家信息生产力战略》，把社会信息化由信息交流、信息媒体，提升到新型生产力的高度。后来又为国家发改委做了《信息生产力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研究》，去年又给国资委做了《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研究》。我本来想以后不再做课题了，结果现在又有人邀我参加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也发现在新经济领域真的还有好多问题需要研究，真是欲罢不能啊！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新经济条件下，不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新路。

习总书记最近说：“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又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有信心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我们发现有许多新经济问题需要大家深入思考。《信息时代三部曲》作者就说，“如果实行信息私有制和信息（由国家）垄断，互联网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信息需要充分共享的特性，提出了信息财富社会化的内在要求”。我认为中国应该大力提倡经济社会化，要摒弃集中计划经济同时还要超越自由市场经济，努力建立社会化的新经济理论和新商业模式。

现在我国电商扶贫做得非常出色，上万个淘宝村，让贫困地区的农民一下子跨越两个时代，实现共同富裕。许多鲜活案例都说明一个问题：“工业经济是嫌贫爱富的经济，信息经济是普惠大众的经济”。传统银行就嫌贫爱富，手机银行就普惠大众。马云就是靠倒二八定律，关注占 80% 的普通大众而发财。“双 11”在西部地区购物热情高于中部，有许多农村青年，到城市打工回去以后就开起了网店，

在网上买土特产，成了千万富翁甚至几亿富翁。我到苏北考察见到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自豪地对我说：“我丈夫和儿子原来都在深圳打工，挣钱来养活我；现在我开了网店，把丈夫和儿子叫回来给我打工，由我来养活他们。”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可能会发现更多的经济蓝海。

有人发明了一个重要词汇（SIMPLEXITY），我把它译作“简化复杂”，并认为这才是互联网的灵魂。那什么是简化复杂？马云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于是有了阿里巴巴；任正非说让世界所有人都能上网，于是有了今天的华为，主要靠“优质低价”打开了欧美市场。谷歌说让天下没有难开的汽车，于是有了无人驾驶。3D 公司说让天下没有难造的产品，于是有了 3D 打印。我觉得还可以有好多领域，通过互联网+，都可能成为是未来能够出彩的新领域和新的蓝海。

我认为，当前最大新经济发展空间可能还是在消除贫困方面。现在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症结就是富人有钱，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穷人想买东西又没钱。现在世界上消除贫困有三种思路：一是西方传统思路，让富人更富以后，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救济穷人，这样搞下去可能越救越穷。第二是靠计划经济或新计划经济杀富济贫，这个路子我认为也走不通。因为许多人按照工业控制论的思维路径理解信息经济，认为把所有信息都集中控制起来，再由信息中心按计划分配给大家，我们最早搞计算机网络就是这个思路。当时世界也有两种参考模式，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由国家邮电部搞大数据库信息中心，让国民通过可视图文专用终端，到国家数据库检索信息。结果被美国的互联网很快打垮了。2000 年我到法国电信考察说你们的可视图文网络怎么样了？他们告诉我我成了鸡肋，600 万可视图文终端要搞互联网改造，3 年改了 40 万，最后还是决定一拆了之。这就是用工业控制论或计划经济搞互联网的教训。

解决贫困问题还有第三种思路，就是以

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切入点，扩大穷人的信息视野，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发展互联网和信息经济只能采取扁平关联的新哲学思维。

现在两种传统经济理论都要失灵：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一个是计划经济理论。有人提出新计划经济理论，我看也是回光返照，不会有好的前途。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我国有些经济学者非常极端，说政府什么也不要管，市场自然会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在世界经济学界都开始反思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和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张五常最近在《经济学为何失败？》的演讲中就提出，亚当·斯密那个年代，面对封建势力，你不自私自利不行。但是现在不同了，自私自利可以带来相互残杀，会带来欺骗，甚至会使人类毁灭！

著名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说：“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们提出了“看不见的手”和完全竞争。而在高通（通信技术）公司的影响下，我逐渐偏离了这些传统的经济学理念，开始研究包含信息和噪声在内的新型经济学，并认为这类新型经济学才是理解人类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

下面讲讲传统商业模式的锈蚀。一个是边际分析，一个是二八理论都有问题，工业经济教人们只要关注 20% 的富人，就能给你带来 80% 的利润。可是现在你不关注那 80% 的穷人，就很可能丢掉所有的市场。马云正是瞄准 80% 的大众市场，赢得了整个电子商务的机会。过去我们经济发展规划是，先东部、后中部、再西部，现在必须注重地域相对均衡发展。

新经济发展正在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以前我国只有两种经济实体，企业和事业。企业不再分类，都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后来又酝酿将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商业性营利企业，一类是公益性非营利企业。我认为还应该再分出一类社会性企业，采取“低费微利”经营模式，提供准公共品。包括自来水公司、公共交通、通信，供电、供气，还有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医疗平台、教育平台、农业平台，3D 打印平台，等各行各业的平台，都应该成为社会性企业。

最后，请大家记住一个重要研究结论：计划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他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利己主义，协同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互利主义。

协同互利并非源自人们美好愿望，而是信息透明以后，自然会形成一种平等互利的经济机理。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许多脑科学前沿研究和多元并发博弈研究结论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信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必然催生新的经济理论和新的生产关系。如果说市场是看得见的手，政府是看不见的手，那么互联网就是促使人们挽在一起的手。

（杨培芳，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民生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代表性著作有《网络协同经济学》、《挽在一起的手》等。本文系作者 2017 年 2 月 28 日在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新经济下企业商业模式奥秘是什么？》论坛上演讲修订稿。）

中国经济学家中的早期党员

66 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有志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党员经受住了考验，甚至做出了牺牲。有些党员在大浪淘沙中，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把自己的终生奉献给了崇高的理想和事业。我看过孙治方、陈翰笙、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的著作资料，30 多年前听过南汉宸、冀朝鼎早年在山西金融界的轶事，与于光远、杜润生接触过。他们的革命历史与学术成就一样辉煌，革命足迹遍布华夏大地。我们要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不仅要学习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也应该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格。在建党 96 周年和“七七事变”80 周年之际，重温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光荣历史，我认为很有必要。本文所说的“早期党员”，特指“七七事变”之前入党的中共党员。

■ 《经济学家周报》副主编 白卫星

我仔细查阅了资料，早期入党的经济学家有 23 人，他们是（以入党时间为序）：

- 孙治方（1908—1983）1924 年入党，当时 16 岁；
- 黄松龄（1898—1972）1925 年入党，当时 27 岁；
- 陈启修（1886—1960）1925 年入党，当时 29 岁；
- 陈翰笙（1897—2004）1925 年入党，当时 28 岁；
- 沈志远（1902—1965）1925 年入党，当时 23 岁；
- 袁孟超（1905—1991）1925 年入党，当时 20 岁；
- 南汉宸（1895—1967）1926 年入党，当时 31 岁；
- 徐雪寒（1911—2005）1926 年入党，当时 15 岁；
- 王学文（1895—1985）1927 年入党，当时 32 岁；
- 冀朝鼎（1903—1963）1927 年入党，当时 24 岁；
- 薛暮桥（1904—2005）1927 年入党，当时 23 岁；
- 秦柳方（1906—2007）1927 年入党，当时

- 21 岁；
- 朱剑农（1910—1986）1928 年入党，当时 18 岁；
- 狄超白（1910—1978）1931 年入党，当时 21 岁；
- 许涤新（1906—1988）1933 年入党，当时 27 岁；
- 杨坚白（1911—2004）1933 年入党，当时 22 岁；
- 顾准（1915—1974）1935 年入党，当时 20 岁；
- 钱俊瑞（1908—1985）1935 年入党，当时 27 岁；
- 杜润生（1913—2015）1936 年入党，当时 23 岁；
- 张锡昌（1902—1980）1936 年入党，当时 34 岁；
- 姜君辰（1904—1985）1936 年入党，当时 32 岁；
- 袁宝华（1916—）1936 年入党，当时 20 岁；
- 于光远（1915—2013）1937 年入党，当时 22 岁；

这 23 位老一辈经济学家，资格老，影响大，都是早年接触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经济学家，特别是陈启修、陈翰笙、冀朝鼎与李大有交往，受李大钊影响比较深。

这些经济学家的革命生涯波澜壮阔——有的在中共领袖领导下工作，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有的在隐蔽战线工作，有的投身根据地建设。入党时年龄最小的是徐雪寒（15 岁）、孙治方（16 岁）、朱剑农（18 岁），都不满 20 岁。入党时年龄最大的是张锡昌（34 岁）、姜君辰（32 岁）、王学文（32 岁）、南汉宸（31 岁），都是 30 多岁。陈翰笙、薛暮桥、秦柳方、杜润生、袁宝华还是经济学界的百岁明星，超长的革命生涯（党龄 80 年左右）更值得大书特书。

从入党时间看，孙治方资格最老。著名经济学家钱俊瑞回忆 1931 年与治方相识的情景说：“呵！一位坚强的火热而又温存的青年革命家，只 23 岁，站在我的面前！我们握手拥抱，接着就一起工作。”（见《孙治方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 页）他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 年底转为中共党员，1925 年从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后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 年夏毕业后，在该校和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不到 20 岁就作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孙治方一生经历种种磨难，青壮年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在抗日救国中被“口诛笔伐”，蒙受不白之冤；进入老年时期又遭受

“无情”打击。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说：“但是治方同志坦然处之，毫不动摇自己的信念，他的刚毅不屈的精神令我肃然起敬。”（见《孙治方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 页）孙治方是被组织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的极少数经济学家（另一个例子是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卓炯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由于孙治方在中国经济理论界的地位至为尊崇，薄一波、姚依林、薛暮桥、于光远等发起成立了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治方经济科学奖。

黄松龄原名黄克谦，是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经济学家。他 1919 年 5 月 3 日参加“五四运动”遭军警逮捕，后获释放。同年夏，结识恽代英、林育南。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奉周恩来指示），中共湖北地下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兼《长江》主编，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宣传部长。1930 年后，任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教授。曾创办《世界论坛》杂志、《民族战线》周刊。40 年代赴延安，任中央财政经济部指导员，中央党务研究室财经组组长。1947 年后任晋冀鲁豫中央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华北局监察院副院长，天津军管会文教部部长。

（下转 02 版）